

# 流亡的日常与人性的微光

——读萨米拉·阿扎姆的短篇小说

□孔阳



萨米拉·阿扎姆(Samira Azzam, 1927—1967)



《超越时间：萨米拉·阿扎姆短篇小说集》英文版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巴勒斯坦文学作为世界文学图景中一道深沉而坚韧的风景,正逐渐被中国读者所熟识。加桑·卡纳法尼、穆罕默德·达尔维什等作家的作品相继译介,让我们得以聆听来自那片土地的心灵回响。其中,有一个格外清越却近乎寂寥的声音——萨米拉·阿扎姆(Samira Azzam, 1927—1967)。这位英年早逝的巴勒斯坦女作家,以其五部短篇小说集及诸多散篇,在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上镌刻下独特而深刻的印记。令人遗憾的是,直至今日,她的作品仍未有一部正式出版的中文译本。这份空白,不仅是中国读者认知版图上的缺失,某种程度上,亦是一位本应被更多人看见的“伟大作家”在跨文化传播中遭遇的“被遮蔽”命运。

2022年,《超越时间:萨米拉·阿扎姆短篇小说集》(Out of Time: The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of Samira Azzam)在英语世界获得关注,为全球读者打开了一扇窗。这部译本如同一把钥匙,让我们得以窥见阿扎姆那以细腻笔触构筑的文学世界:那里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或激昂的政治宣言,有的只是巴勒斯坦难民营、黎巴嫩军营生活中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离散之痛与生存韧性。她的写作,将历史的巨变与民族的创伤,

武器”承载了时代与民族的千钧重负。她的目光始终投向那些被历史洪流裹挟的“小人物”——挣扎求存的妇女、心灵受创的儿童、困顿的知识分子、无名的劳工,通过对他们日常生存状态精微而克制的描绘,让战争和离散的残酷性,从人物细微的动作、瞬间的思绪、无声的牺牲中自然渗透出来。这种“以小见大”“以轻写重”的艺术路径,令人联想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对国民灵魂的深刻剖析、老舍对市井百姓命运含泪的幽默、沈从文对乡土人情温情的凝视。尽管文化语境迥异,但那份对底层命运的深切悲悯、在苦难中发现人性光亮的执着,以及通过个体命运折射时代风云的现实主义精神,形成了跨越时空的深刻共鸣。

## 日常的诗学

阿扎姆的现实主义是内敛而充满象征意味的。她擅长从看似平凡的日常片段中,挖掘出深邃的情感与存在困境,赋予其超越具体时空的普遍意义。这在其代表作中体现得尤为鲜明。

《牺牲的面包》以1948年阿卡一家战地医院为背景,讲述了年轻士兵拉米兹与护士苏阿德在战火中萌生的爱情,以及他们最终面临的残酷抉择。阿扎姆并未将人物塑造简单的英雄或受害者。医院成为战乱世界的微型缩影,救死扶伤的本职与个人情感的萌动交织,却在极端环境下被迫导向一种令人心碎的“牺牲”。标题中的“面包”,既是维持生命最基本的物质,也可能隐喻着爱情、幸福乃至人性本身,在集体命运的巨轮下不得不作出的献祭。苏阿德这一形象尤其动人,她既是专业、坚韧的护理者,也是在恐惧与柔情中挣扎的普通女性。阿扎姆通过这个人物的展现,战争对普通人情感与伦理世界的无声撕裂,其力量不亚于任何直接的控诉。她侧重于从女性内在视角出发,展现其主体意识在极端环境中的持守与微光。

《又一年》(或译《再等一年》)则将笔触对准了离散的漫长与团圆的渺茫。老妇人乌姆·阿布鲁德怀揣着基督教朝圣许可,从黎巴嫩赴耶路撒冷的曼德尔鲍姆门,期盼与1948年失散的女儿短暂重逢。旅途中的絮叨回忆、忐忑期待,与最终因官僚程序或命运捉弄而落空的结局,构成了一幅极致温暖又极致心碎的画面。全篇没有一句直接的政治批判,但一位母亲年复一年、希望与失望循环的跋涉本身,便是对家庭被强行撕

裂、故土可望不可即的民族悲剧最沉静的控诉。这种通过极致化的个人日常经验来承载集体创伤的叙事策略,与中国文学中关于离散、乡愁的悠久母题产生了深切的共振。阿扎姆的克制,让悲伤拥有了更绵长、更具穿透力的回响。

最能体现阿扎姆象征艺术与哲学思考的,或许是《时钟与人》(或其中核心故事《人与闹钟》)。主人公对一只闹钟近乎偏执的依赖,构成了一个丰富的隐喻复合体:它既是现代工业文明规训者、切割时间的象征,在流亡者的语境里更成为个体在身份悬置、生活失序的动荡中,试图抓住一点可控的秩序与安全感的徒劳努力。滴答声既是日常生活的节奏,也是时间无情流逝、机会永逝的提醒,隐喻着流亡者对回归故土、重建生活的希望与焦虑。这篇小说以一种近乎寓言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塑造着读者对巴勒斯坦民众特殊生存境遇的理解。巴勒斯坦作家阿达尼亚·希布莉曾言,这篇作品对她理解民族命运的影响,远胜许多直白的政论。这正是阿扎姆短篇小说的魔力:以最小的叙事单元,撬动最沉重的意义深渊,实现“以小博大”的美学效果。

## 真诚地触及人性的光辉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阿扎姆的作品自然流淌着清晰的女性意识,但这并非一种标签化的激进宣言,而是浸润在叙事肌理中的内省与坚韧。在《小事》等集子中,她持续关注妇女在传统父权社会、战争阴影与经济压力下的生存境遇。她笔下的女性,往往是家庭与社区在灾难中得以维系的情感枢纽与行动者。她们承受着重负,却不失尊严;她们深陷困境,却常以惊人的韧性智慧寻出路,甚至完成悄无声息的反抗。无论是《牺牲的面包》中的护士苏阿德,还是在其他故事中为家庭奔波的母亲、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女儿,她们很少是全然被动的受害者,而是拥有复杂内心世界的持守与微光。

这种深沉而克制的女性书写,让人联想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丁玲、萧红、张爱玲等女作家的探索。她们同样在民族、阶级与性别的多重话语张力中,艰难而执着地刻画着女性的经验与命运。阿扎姆与她们一样,拒绝将女性形象简单化、符号化,而是致力于呈现其生存的真实状态与精神世界的丰饶。她的女性主义,是一种植根于具体历史情境、与民族苦难同呼吸共命运的“实践的女性主义”,其力量正在于这份深

沉的真实感。

在巴勒斯坦文学史上,阿扎姆与加桑·卡纳法尼等人同属短篇小说创作的“黄金时代”,是早期“抵抗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然而,她的“抵抗”有其独特路径:那不是旗帜鲜明的外部对抗,而是一种“日常抵抗”或“文化抵抗”。她通过忠实记录普通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方式、情感结构与记忆,在被占领和流亡的现实,顽强地守护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身份与精神家园。这种抵抗因其嵌入日常而更持久,因其关乎具体的人而更触动人心。阿扎姆注重个体心理的真实与人性的复杂多元,避免了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这使得她的作品获得了超越具体政治议题的永恒文学价值。

今天,在全球化和跨文化交流日益深入的年代,细读萨米拉·阿扎姆,对于中国读者和文学界而言,具有多重意义。她帮助我们超越国际新闻中简化的地缘政治框架,从血肉丰满的个体生命经验出发,去理解巴勒斯坦问题的深刻人文维度。她的作品告诉我们,苦难与抵抗,最终是关系到人的尊严、记忆与希望。同时她的创作实践为我们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他者视角。在如何让现实主义笔触更具心理深度、如何运用象征与隐喻提升日常书写的诗意与思想容量、如何在书写苦难时避免陷入悲情宣泄而保持克制力量、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既立足本土经验又表达人类共通情感等方面,阿扎姆的作品可以称为范本。

巴勒斯坦批评家费萨尔·达拉吉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曾言:“阿扎姆尚未获得她应得的赞誉。”因为她英年早逝,还是因为她的伟大隐藏在“超时”(Out of Time)的流亡日常中?

但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阿扎姆以短篇小说这一形式证明:文学的伟大,从不取决于篇幅的长短或声调的高低,而在于是否真诚地触及了人性的幽微与光辉,是否在破碎的世界中依然执着地寻找并确认人的尊严与希望。

(作者系作家,供职于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 “一带一路”文学之光



## 莎士比亚厅与七幕人生——

# 在老去之前,应该做些什么,才不枉此生呢?

□王敬慧

澳大利亚最古老的图书馆是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建于1826年。在这座图书馆里有一个莎士比亚阅览室,其汉语版的官方导览册称其为莎士比亚厅。该厅已经有整整100年的历史,但是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并不对公众开放。直到2023年,它才开始每天开门,让读者能够近距离欣赏珍贵藏书。寻着莎士比亚的召唤,笔者到访此处,感觉该图书室的收藏品类及编目与美国华盛顿的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没法比。后者拥有更丰富的莎士比亚相关资料,包括大量17世纪印刷本、手稿和相关档案,但是这个澳大利亚的莎士比亚厅有一个让人难忘的特殊之处就是它的彩窗。和教堂里常见的圣经故事彩窗不同,莎士比亚厅里的彩窗所描绘的是《皆大欢喜》里提到的七幕人生。

对笔者而言,莎士比亚的剧本载体是文字,我最先是通过读文字在脑海中构建图景。但是在这个有七幕人生彩窗的莎士比亚厅里,过去脑海中已经构建的有关七幕人生的图景有了些许变化。关于七幕人生的具体细节,可以参考人民文学出版社朱生豪先生翻译的版本,在《皆大欢喜》中杰奎斯的独白如下:

全世界是一个舞台,  
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  
他们都有下场的时候,也都有上场的时候。  
一个人的一生中扮演着好几个角色,  
他的表演可以分为七个时期。  
最初是婴儿,在保姆的怀中啼哭呕吐。  
然后是背着书包、满脸红光的学童,  
像蜗牛一样慢腾腾地拖着脚步,  
不情愿地呜咽着上学堂。  
然后是情人,像炉灶一样叹着气,  
写了一首悲哀的诗歌咏着他恋人的眉毛。  
然后是一个军人,满口发着古怪的誓,  
胡须长得像豹子一样,  
爱惜着名誉,动不动就要打架,  
在炮口上寻求着泡沫一样的荣名。  
然后是法官,胖胖圆圆的肚子塞满了阉鸡,  
凛然的眼光,整洁的胡须,  
满嘴都是格言和老生常谈;  
他这样扮了他的一个角色。  
第六个时期变成了精瘦的跛着拖鞋的龙钟老叟,  
鼻子上架着眼镜,腰边悬着钱袋;  
他那年轻时候节省下来的长袜子套在他跛弱的小腿上显得宽大异常;

他那朗朗的男子的口音又变成了孩子似的尖声,  
像是吹着风笛和哨子。  
终结着这段古怪的多事的历史的最后一场,  
是孩提时代的再现,全然的遗忘,  
没有牙齿,没有眼睛,没有口味,没有一切。  
曾经的“读”在莎士比亚厅里变成了“看”,彩窗把这段很

多人几乎会背的比喻变成了可以被凝视的图像:婴儿、学童、恋人、士兵、法官、老者、行将就木者。它的动人之处,不在于把抽象概念简单“画出来”,而在于细节几乎逐一对应原文的描述,且栩栩如生——比如婴儿被抱在怀中,呈现出初临世间的无助的哭泣;学童满脸不情愿的表情,“学校”的字样就是他逃离的方向;年轻恋人的笔下是写不完的情感,眼神与身体都表达着渴望;士兵带着骁勇的冲劲与争胜的锐气,随时准备着向“危险”进攻;法官的神情沉稳、衣饰端正,体现着秩序与权威;老者的体态开始收缩,步伐与目光都显出退场的迹象;而最后那位行将就木者,几乎只剩轮廓与余光,像被一点一点剥离了感官——让人不由得想起英文原文中那句冷静得近乎残酷的“sans(丧失)…… sans…… sans……”。观看中,我忽然意识到读字和看图的区别,前者需要脑补,而后者则可以让生命图景呼之欲出。

文字里的想象,与彩窗里的具象并不一致。曾经我脑海中那段对白段落形成的想象是:舞台、登场、退场、不同角色更替——这些靠词汇生成的“版本”并没有鲜活的细节,它的留白在于我已经把自身的经验投进去。于是“七幕人生”在我脑中并非七张明确的画面,而更像七种状态:婴儿的无助、学童的抗拒、恋人的自恋、士兵的莽撞、法官的自信、老者的退场,以及最后的空无——它们并不一定按顺序出现,甚至会在同一个人身上纠缠重叠。但是看到彩窗的时刻,剧本中的独白转变成了已经确定好的七组形象:你几乎无法逃离它对你施加的阐释。尤其当我看见最后两幕的“老人”,明显是一个

人,我脑海中不禁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人老去的阶段有两幕?它们的区别是什么?看着彩窗,我努力寻找答案。与第六幕的老人相比,第七幕的老人缺少的似乎是一种能够自主的精气神。莎士比亚文字版关于“最后一幕”的描述,只是让我感受到文字的节奏:一个“sans(丧失)”接一个“sans(丧失)”,像一个被剥离的清静,冷静到近乎残忍。但彩窗把“残忍”变得更具体——不是修辞意义上的具体,而是身体意义上的具体,让人不禁感慨汉语“老小孩”这个词不仅仅讲老人家的不按常理出牌,也指向他们生命的不可自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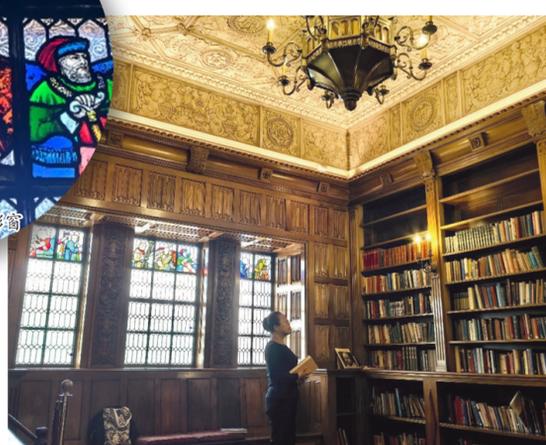
其实关于这种个体终将退场的空虚感,今年在新南威尔士美术馆展出的超现实主义雕塑家让·穆克(Ron Mueck)的雕塑“床上老妇人”也有异曲同工之妙。通过巧妙运用玻璃纤维、

树脂和硅胶等材料,艺术家极度逼真地展现了一位老妇人的暮年时刻。她静静地蜷缩在白色的布单下,丝丝可见的白发、皱褶的皮肤、下降的躯体与蜷缩姿态如此具象化,让观者能够感觉到老妇人的轮廓是缩小的,身体在变轻、光线在变淡,人是存在的,但又仿佛被推向边缘。老妇人在渐渐退场,观众却被迫在场,不得不以近乎窥视、几乎可以听到她呼吸的距离,目睹生命和气息的消散。“床上老妇人”的雕塑与莎剧里所描述的七幕人生的最后一幕形成互文:我们每个人终将不在中心,无从掌控。同样都是退场,彩窗和雕塑通过景和物,让观者在共享空间里直面那种脆弱、迟疑与不可逆的消逝,于是“人生如戏”的落幕不再是旁观的哲理,而变成一种近距离的共情。

回到莎士比亚厅里面“七幕人生”的彩窗,让我难移开目光的,不是人生中间那些光亮或喧闹的阶段,而是第一幕与最后一幕的首尾比较。婴儿与行将就木者之间隔着漫长的人生,却在本质上彼此照应——都是一种无法自持的状态:第一幕的无助,是因为人还没有掌握语言。婴儿啼哭,不是因为“想表达意义”,而是因为他只能以哭作为存在的证明。最后一



莎士比亚阅览室的彩窗



作者王敬慧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的莎士比亚阅览室

幕的无助,则是语言与身体逐渐退化:感官被一项项剥夺,判断力和行动力不再听从意志。两者都把人推回一种“依赖”的关系里——人生的首尾两段需要他人的怀抱、理解和耐心。人无法靠自己完成生命的闭环,很多时候需要靠他人的照护、社会的制度以及整个共同体对脆弱的理解与共情。我们往往把人生理解为“越来越能掌控”,但莎士比亚用这两幕提醒我们:人的生命从来不是永远的强大,而是以无助为起点,也可能以无助告终。所谓成熟,并不是保持强大,而是懂得如何与无助



莎士比亚肖像 约翰·泰勒 绘

共处,如何在他人无助时不转身离开。这样去理解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也未尝不可。

其实承认脆弱是人看清自己后的结果,而不是羞耻和懦弱;承认幼有所护、老有所养的担当,是个体也是群体的文明核心。当我们真正接受这一点,面对自我或他人的无助就不会心生恐惧或厌恶,而产生责任感:我能做什么,让自身或他者在无力时仍保有尊严与被看见的感觉?望着莎士比亚厅里的彩窗,我获得的启迪是:七幕人生并不因为被做成彩窗就变得更“权威”,它反而提醒我——每一幕都值得被认真对待。

读莎翁剧本时,我把自己交给语言的流动;看彩窗时,我直面“角色”的定型;一圈圈环绕着细观“床上老妇人”雕塑时,我知道那是我们每个人终将面对的不可躲避的“老去”。而在“老去”到来之前,应该做些什么,人才不枉此生呢?在没有找到确切答案之前,唯有认真感受活着的感觉,我仍会选择读书。正如在离开这座澳洲最古老的图书馆之前,俯视大厅的地面,看到的是人类早期的大航海地图;环顾四壁,看到托马斯·卡莱尔这句话:“书籍中蕴含着整个过去时代的灵魂;当过去的一切实体与形质已如梦般完全消逝时,书籍仍能清晰地发出过去的声音。”看看手中莎士比亚厅的导览册,上面介绍为什么要读莎士比亚,因为“他不仅属于他的那个时代,他千古流芳”。(作者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